

晉陽文化研究

第三輯

◇ 主編 霍潤德



太原市三晉文化研究会 編

山西出版集團
三晉出版社

太原市三晋文化研究会 编



◇ 主编 霍润德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晉陽文化研究

第三輯

山西出版集团
三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晋阳文化研究. 第三辑/霍润德主编. —太原: 三晋出版社, 2009. 3

ISBN 978-7-5457-0052-7

I. 晋… II. 霍… III. 文化史—研究—太原市—古代
IV. K29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32310 号

晋阳文化研究(第三辑)

主 编: 霍润德

责任编辑: 朱慧峰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集团·三晋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4922268(发行中心)

0351-4956036(综合办)

E-mail: sj@sxpmg.com

网 址: <http://sjs.sxpmg.com>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承 印 者: 太原市财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9.75

字 数: 260 千字

印 数: 1-2000 册

版 次: 2009 年 3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3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7-0052-7

定 价: 46.00 元

晋阳文化研究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编 谷文波

主 编 霍润德

副主编 杨光亮 李 非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振芳 孔祥毅 许一友 孙安邦

杨绪正 吴国荣 李书吉 李克仁

孟繁仁 张明远 张国宁 张海瀛

郑学诗 郭尚武 高春平 袁旭临

梁 枫 降大任 常一民 渠传福

景占魁 魏宗禹



前言

《晋阳文化研究》已经出版发行三期了,受到了学术界和读者的广泛好评。为了进一步提高晋阳文化研究水平,并配合《太原通史》的编撰,采纳了省城专家的建议,按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金蒙元、明清、民国等六个历史时期的主要内容进行编纂,使读者能够比较集中地了解每个时期的主要研究成果和学术观点。为了及时反映晋阳文化研究的新成果,本辑在以魏晋南北朝为主要内容之外,还编辑了其他历史时期的论文,共计14篇。

晋阳文化是以晋阳大地为载体,由中原华夏民族和北方游牧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艰苦奋斗,开拓创新,融中原农耕文化和北方游牧文化为一体的地域文化。它既具备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普遍性,又具有晋阳地域文化自身的特殊性。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晋文化的主体和主流;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晋阳文化源远流长,早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人们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的改进,原始农业和原始手工业的分工,新石器中晚期文化的地域分布及其特征逐渐显现出来。娄烦新石器遗址群代表的文化类型,受着晋南、河套地区文化的影响,是吕梁地区仰韶文化的延续。义井遗址的包含物及其发达的彩陶,有着强烈的地方风格和地域特征。它一改庙底沟文化的传统,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为其后东太堡、光社等文化时期的延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义井、东太堡、光社遗存表现出来的独特的文化类型,正是晋阳文化形成的源头。

历经三代,到春秋时期,晋国正卿赵鞅(简子)重建晋阳城,并以



晋阳为根据地,击败了晋国“六卿”中的范氏、中行氏,成为诸卿中的盟主(见《侯马盟书》)。他执政时期,顺应时代潮流,率先在税亩、刑律、宗法制度等诸方面进行改革,为赵氏立国奠定了政治经济基础,为我国封建制度的确立,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儿子赵毋恤(襄子),凭借“固若金汤”的晋阳城,联合韩、魏灭掉智氏,促成“三家分晋”,形成了“战国七雄”的格局。后经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全面改革,改变和调整了赵国的民族结构,冲淡了“华优夷劣”的旧观念,加速了戎狄部族的汉化过程,使赵国一跃成为与关中秦国抗衡的东方强国。简子、襄子和武灵王的改革思想,孕育和形成了初期晋阳文化的内涵和特征。

魏晋和北朝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所谓“五胡”涌入中原,形成了我国北方民族大融合的高峰,晋阳地区成了北方各民族逐鹿中原的广阔舞台。特别在北朝时期,高欢、高洋及以下诸帝,以晋阳“霸业所在,王命是基”,大兴土木,营建晋阳城,其壮丽超过邺都。高洋尝登童子寺,遥望晋阳城,感慨万千,曰:“此是何等城!此是金城汤池,天府之国。”晋阳城从北魏霸府、东魏下都到北齐别都,不仅成为这个时期多民族文化交流的大都会,而且也是西域文化融入华夏文化的中心。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相继在太原地区发掘的北齐东安王娄睿墓、武安王徐显秀墓和稍晚的隋代虞弘墓的壁画、浮雕等内容,展示了中西文化交流的盛况。这个时期多民族文化和融合过程,极大地丰富了晋阳文化的内涵,使其步入了成熟的阶段,形成了多民族文化融合为特色的晋阳文化。

隋唐五代时期,李渊、李世民父子从晋阳起兵,建立了我国封建社会最强盛的王朝。唐太宗李世民自青年时代起,受到了晋阳地区多民族文化的熏陶,吸取了自春秋战国以来,特别是北朝时期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精华,摒弃了“贵中华,贱夷狄”的世俗,提出了“中国根干也,四夷枝叶也;割根干以奉枝叶,木安得滋荣?”(《资治通鉴·唐纪》)



的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晋阳文化的思想内涵。五代突厥沙陀部先后在晋阳起兵,建立了后唐、后晋、后汉及北汉政权,以晋阳为国都或陪都。自春秋战国以来,先后有九个独立王朝在晋阳城建立了国都或陪都,除战国赵都和大唐北都之外,其他七个分别由氏族、鲜卑族和鲜卑化汉人、突厥沙陀人建立,时间跨度近1500年。晋阳城作为“九朝古都”,此间多民族经济、政治、文化的互相碰撞、吸收,使晋阳多民族文化特征更加鲜明。

宋辽金元至明清,晋阳地区是北方契丹、女真、蒙古、满族(后金)入主中原的战略要地。宋、金、元、明、清更替的过程中,太原宋守将王禀、金守将乌古伦德升、元守将扩廓帖木儿、明起义军守将陈永福等,都把坚守太原作为己任,传承着晋阳文化多民族融合的内涵和不屈不挠、英勇斗争的人文精神。明清源于太原地区的晋商崛起,开近代跨国贸易之先河,票号林立,辐射日本、朝鲜、俄罗斯和东南亚、中亚等广阔地区,促进了中外经济的交流和发展,至今为海内外人士所赞誉。这个时期,晋阳文化在经济、政治、文化等诸方面,得到了全面的传承和发展。

清末至近代,太原地区发生的义和团反洋教斗争、大中学堂学生和工商界发起的争矿运动、同盟会山西分会发动的辛亥起义、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等,前仆后继、英勇斗争,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为中华民族的存亡、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个时期,特别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太原地区的革命斗争进入了崭新的时代。与此同时,太原的文化教育事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传播新的文化思想和科学知识。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太原文瀛湖畔,成了爱国志士和文化名人交流思想、弘扬优秀文化的场所。近代以来太原地区的革命斗争和新文化的构成,为晋阳文化赋予了新时代的革命思想和科学内涵,晋阳文化得到了质的升华。

几千年来,特别是春秋战国以来,晋阳文化孕育、形成、发展、传



承和创新的过程,充分反映了晋阳文化深厚的积淀和丰富的底蕴,体现了晋阳地区人民粗犷、豪放、不屈不挠的性格和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的人文精神。晋阳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是历史赐予并州儿女的一笔丰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先进的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它传承不衰的凝聚力、支撑力,是托起城市形象的力量所在。晋阳文化对于太原市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坚持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率先发展,起着强有力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这样不可替代的作用。

近几年来,太原市三晋文化研究会组织了省城一批从事历史文化研究的专家,倾心研究晋阳文化,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晋阳文化研究”丛书的出版,受到了省、市领导和省城学术界的广泛好评。为此,我们希望有更多的省城和国内外专家学者加入到晋阳文化研究的行列中来,坚持文化创新,深入发掘晋阳文化的深刻内涵和鲜明特色,出更多的优秀成果。为太原市实施“十一五”规划,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出贡献。

编辑出版的过程中,著名古文字学家、书法家张颌先生题写了书名,张星亮先生篆刻了篆书名章,三晋出版社热情支持出版发行,这里一并表示感谢。

张颌

2009年3月于太原

目 录

前言	霍润德 / 1
魏晋南北朝时期太原的历史地位与文化成就	李书吉 / 1
中国古代宗教与北魏晋阳佛学净土宗文化	魏宗禹 / 15
浅谈太原北齐墓葬文化	李 非 彭娟英 / 72
魏晋南北朝并州(晋阳)地区各民族大融合述略	降大任 / 79
刘琨据守并州始末	渠传福 / 101
五胡十六国与并州述略	冯素梅 / 117
试论北朝时期的太原经济	许一友 温国强 宋文庆 / 132
历史文化名都太原	杨光亮 / 185
从考古材料看西汉时期太原手工业发展情况	左正华 / 207
民国时期的太原工业	景占魁 / 219
徐继畲的教育理论与实践	高春平 / 252
论太原市阳曲县不二寺彩塑的创建年代	胡文英 张明远 / 267
试析晋祠园林的文化内涵	卢 渝 程原生 / 287
观赏牡丹源于山西说	王振芳 / 304



魏晋南北朝时期太原的历史地位与文化成就

李书吉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06)

[提 要]:魏晋南北朝时期,山西是民族融合的主要舞台。从十六国到北齐,平阳、平城、晋阳依次为少数民族建立的三个都城,顺序成为三个民族融合的中心。最后此中心固定在晋阳。诸多改革由此发端,东魏称“霸府”,北齐正式建成陪都。北齐的邺城—晋阳,隋唐的长安—晋阳,五代时的洛阳—晋阳,开封—晋阳,皆为中古时期都城建制的范式,有极为重大的意义。魏晋南北朝时期,太原士族昌盛,人才辈出。史学界著述丰富,有突出贡献者为王沈、孙盛两大家。王沈著《魏书》,孙盛著《魏氏春秋》、《晋阳秋》等,这些史籍赖裴松之《三国志注》得以保存,是研究三国史不可或缺的珍贵文献。文学界成就卓著,著名的文学家孙楚、温子昇都有诸多名篇传世。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关键词]:陪都;史学贡献;文学成就

一、太原陪都地位的奠定

山西的地理形势是东有太行、西有吕梁、南有中条、北有恒山,谓之四山环抱。如果说这是一个大四塞的话,太原又是一个大四塞外

作者简介:

李书吉,1955年生,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导、院长。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会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山西省北朝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山西省历史学会副会长。发表论文30余篇,主、参编著作9部。



围下的小四塞之地,清人顾祖禹在《读史方輿纪要》中说:太原“东阻太行、常山,西有蒙山,南有霍太山、高壁岭,北扼东径、西径关,是以谓之四塞也”。而其境内和周边又有龙山、悬瓮山、系舟山、天门关、石岭关、赤塘关,旧关环绕其间地形尤为复杂,是控扼北部之咽喉,素有“北门锁钥”、“中原北门”之称。历史上凡是在长安、洛、汴、邯、京蓟地域建立政府者,都以山西为主要屏障,而重镇往往设在太原。除自身地理条件外,太原北靠游牧民族。太原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北部源源不断南下的游牧民族有直接的关系。历史上几个民族融合的大事件都发生在太原。周初有叔虞封唐,周成王命叔虞“启以夏政,疆以戎索”。战国三家分晋,疆域最大的是赵国,赵国占有今山西的中部、北部及东南部地区和河北东南部和豫北一部分。赵国作为国策实行了“胡服骑射”。其后到了三国曹操时把附属东汉的匈奴分为五部都安置在山西,而这五部的安置正环绕太原,以太原为中心。由此形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太原各种政权犬牙交错、频繁兴替的局面。

永兴元年(304年),匈奴北部都尉在左国城(今山西离石)称王反晋。永嘉二年(308年),刘渊迁都平阳(今山西临汾)称帝。这是北方各民族在山西的第一次大集合。有五种力量汇聚在太原周围。石勒据襄国(河北邢台)。王浚据幽、燕,鲜卑拓跋氏据雁门,刘渊据平阳,刘琨据并州。大的力量有三支,一是西晋刘琨据并州,二是刘渊汉国政权以太原南部平阳为据点,三是鲜卑拓跋部据北部雁门。三支力量形成两大阵营,一为西晋刘琨、拓跋部联盟,二为匈奴汉国。两大阵营争奇的主要目标是晋阳。结果是匈奴汉国政权攻破晋阳,并于316年长驱南下,灭西晋。

以西晋灭亡为标志,各种势力开始了第二轮对晋阳的争夺,这一时期头绪尤为纷乱,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后赵同前燕在晋阳的对峙。西晋灭亡后,北方为后赵石勒所控制,后赵虽都邺城,但晋阳仍是其主要屏障。后赵政权被冉闵推翻,冉闵政权又被鲜卑



慕容氏建立的前燕击败,前燕占领晋阳。第二阶段是前燕同氏族苻氏的前秦政权在晋阳的对峙。东晋太和五年(370年)前秦苻坚派王猛攻下晋阳。并顺势攻陷邺城,前燕灭亡。第三阶段,后燕、西燕争夺晋阳。淝水之战前秦被东晋击败后,后燕同西燕又开始了对晋阳的争夺。太元十九年(394年),后燕慕容垂分兵三路进攻西燕,终于击败西燕慕容永攻占晋阳。第四阶段,代国与后燕对晋阳的争夺。鲜卑拓跋氏的代国建立后,于皇始元年(396年)八月,拓跋珪亲率大军四十万由马邑(今山西朔州)越勾注山(在今山西代县)进攻后燕慕容宝,于九月攻破晋阳,天兴元年(398年)攻克邺,后燕灭亡。同年七月,拓跋珪改国号为“魏”并称帝,建都平城。北方民族融合中心由平阳移至平城。

北魏后期发生了六镇起义,晋阳为北魏占领。接着开始了第三轮对晋阳的争夺。六镇起义后,尔朱荣控制晋阳。此后尔朱荣以晋阳为大本营,三次南下洛阳。第一次下洛阳发动了“河阴之变”,第三次下洛阳被北魏孝庄帝杀害。其侄子尔朱兆由汾阳占据晋阳,不久南下洛阳俘庄帝至晋阳杀害,以晋阳遥控洛阳。永熙二年(533年),尔朱兆部下高欢叛变,击败尔朱兆,取得并州。高欢在晋阳建丞相府,同时将恒州、燕州、云州三州之鲜卑拓跋部、慕容部迁至晋阳附近,在今原平、寿阳、文水设侨置州郡,又将六镇镇民迁至晋阳、孝义、平遥,使晋阳成为高氏的政治、军事、文化基地。从东汉后期开始,经过魏晋南北朝三百余年的民族冲突、交往,最后将民族融合的中心固定在太原。

上述情况,可给我们如下启示:其一,魏晋南北朝时入境的周边民族经过长时期的游移、流动,其活动的第一个中心是山西南部的平阳,第二个中心是山西北部的大同,而第三个中心是山西中部的太原,并最后落脚于太原。其二,即使是以平阳、平城为中心的时候,晋阳也是各种势力争夺的主要目标。其三,由于太原在北方民族融合中心地位的奠定,使汉族政权重新统一北方成为可能,并由此出现了



其后不久的大唐盛世。

高氏经营晋阳，在晋阳建“霸府”。其后北齐高洋、高殷、高演、高湛、高纬五朝都以晋阳为“别都”。唐李渊晋阳起兵后在太原设“并州大都督府”。武则天即位后以晋阳为“北都”。其后一直到代宗李豫都以晋阳为“北都”或“北京”。唐后期李存勖由晋阳起兵建后唐，以晋阳为“北都”，后晋石敬瑭以晋阳为“北京”，后汉刘知远亦以晋阳为“北京”。这种陪都模式的构成不是偶然的，是由晋阳的特殊地理环境和汉族同游牧民族长期冲突、碰撞、融合的形势所决定的。

太原作为陪都和民族融合的中心的表现是他成为北方交通的枢纽和贸易中心。以太原为中心向东南可达邺城、洛阳，向南至蒲津可达长安，向北经过新兴，越雁门，经马邑可达平城或至云中。太原是东西南北的交通要冲，同国内外贸易交往很频繁。这种局面是由平阳、平城、晋阳作为都城不断发展而来的。史载：北魏时“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矣”⁽¹⁾。北齐时，太原同西域的贸易更为频繁。胡族权贵经商者，蔚然成风。如晋阳城中高阿那肱在侵占的民地上，盖起店铺门面房八十余间，租赁给商人，“此店收利如食千户”⁽²⁾。北齐娄睿墓壁画上反映的更是一队浩浩荡荡的来晋阳贸易的西域商队。另外《北史·齐本纪》载：“一裙直万金，镜台直千金，竟为变巧，朝衣夕弊”。这一方面说明当时宫廷中的奢靡，另一方面也说明贸易已进入皇宫。还有一更有趣的记载说：“南阳王绰，始十余岁，留守晋阳，爱波斯狗”，可知西域波斯狗随商人一同传入晋阳。

太原在当时社会文化、习俗礼仪上也有诸多贡献。如《北齐律》的制订，该律将十恶八议入法，是我国法律史上以礼入法的标志性成果。《北齐律》同其后的《开皇律》、《大业律》、《永徽律》、《开元律》以及《唐律疏议》一脉相承。法学界公推《唐律疏议》为中华法系之范本，但《北齐律》是中华法系形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另如，礼制和生活习俗方面，礼制也以唐礼为集大成者。而北齐



礼仪对唐礼贡献尤多,如祭祀、婚嫁、服制、饮食、朝会等方面的礼仪制度多为唐人采纳和继承。日常服饰方面,《梦溪笔谈》卷一说:“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窄袖绯绿短衣,长靴,有蹀躞带。”这里谈到,自北齐以来服饰变化之大,确是事实。北齐在吸取汉服的基础上对胡服进行了大胆的革新,相当程度上可说形成了中国古代服饰发展的定势。但说“全用胡服”则不然。《旧唐书·舆服志》称:“燕服,盖古之裘服也,今谓之常服。江南则以巾褐裙襦,北朝则杂以戎夷之制。爰自北齐,有长帽、短靴、合裤、袄子,朱紫玄黄,各任所好”,这是符合实际的。北齐的“短靴、合裤、袄子”,已是经过改造了的服饰,实际上是在汉服的基础上“杂以戎夷之制”,并非完全袭用胡服。这里说的“巾褐裙襦”是指传统汉装的“上衣下裙”制服饰,而“合裤、袄子”的配合则是“上衣下裤”制,这是中国服饰史上的一次重大的革新。这种“上衣下裤”制一直流传到今天。这些变革都应是在晋阳发端的,因为晋阳是北齐实际上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并且这里是多民族聚集的地方。

二、史学两大家及其他史学家

太原的史学撰述和研究成果颇盛,出现了两位名家,即王沈、孙盛。

王沈,曹丕任太子时,做过太子文学、中庶子,魏明帝时先后为兖州刺史及征南大将军。走的是曹魏时期典型的由士到官的路子。著述尚有《治论》、《诫子训》、兵法文论十余篇⁽³⁾。可见他在政治、军事、文学等方面的造诣。三国时期,魏、蜀、吴国均由官方指定文臣修撰本朝史书。魏国由王沈修成《魏书》四十卷。王沈原本打算同当时的荀颢、韦诞、应璩、阮籍、孙资、傅玄等一同撰写,但因种种原因,最终由王沈独撰成书。曹魏史籍流传至今的是陈寿的《三国志》,而陈寿《三国志》的主要史料来源是王沈的《魏书》和鱼豢的《魏略》。

王沈的《魏书》,据《晋书·王沈传》所载,“多为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也”⁽⁴⁾。唐刘知几论云:“其书多为时讳,殊非实录”。“时讳”之评缘何而来?因写魏史在当时有两难:三国曹魏前期名义上是汉朝天



下,而实权操在曹氏手中,此为一难;而曹魏后期,名为曹氏政权,而主政者实际上又是司马氏,这为二难。王沈《魏书》是在司马氏的授意下撰写的。王沈曾背叛曹髦,暗中投靠司马昭,故而下笔回护司马氏。《晋书·王沈传》说他“既不忠于主,甚为众论所非”。

其后陈寿修《三国志》,实际上仍沿袭了王沈《魏书》对司马氏的回护。但陈寿的《三国志》长于叙述,⁽⁵⁾又述事简略,避免了像王沈那样明显的“时讳”。虽然如此,陈书之所以为后人所认可,主要取决于《三国志》裴松之注。而在裴注所补充的材料中,采用王沈《魏书》最多,这一点《隋书·经籍志》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据统计,《三国志》共引用《魏书》材料173条。其中《魏志》引用多达162条,《蜀志》只7条,《吴志》仅4条。

可见,王沈《魏书》虽有“时讳”之病,但史实的记载即使在今天看来,仍有较高价值,保存了大量珍贵的材料。《三国志·武帝纪》引用王沈《魏书》一段较长的文字,写曹操在东汉末年大乱时对当时时弊的一些认识和在乱世机警、权术的表现。

《魏书》曰:“太祖从妹夫潏强侯宋奇被诛,从坐免官。后以能明古学,复征拜议郎。先是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谋诛阹官,反为所害。太祖上书陈武等正直而见陷害,奸邪盈朝,善人壅塞,其言甚切,灵帝不能用。是后诏书敕三府,举奏州县政理无效,民为作谣言者免罢之。三公倾邪,皆希世见用,货赂并行,强者为怨,不见举奏,弱者守道,多被陷毁。太祖疾之。是岁以灾异博问得失,因此复上书切谏,说三公所举奏专回避贵戚之意。奏上,天子感悟,以示三府责让之,诸以谣言征者皆拜议郎。是后政教日乱,豪猾益炽,多所摧毁,太祖知不可匡正,遂不复献言。”

这是对曹操的一段较为客观的评价。《资治通鉴》用了这段材料的一句话“是岁以灾异博问得失,因此复上书切谏”。⁽⁶⁾

又比如评价曹操用兵尚奇,“其行军用师,大较孙、吴之法,而因事设奇,讐敌制胜,变化如神,自作兵书十万余言”⁽⁷⁾;善用人才,“拔于



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⁸⁾；手不释卷，“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等。

其次，保存了研究三国经济、政治的至为关键的材料。屯田是关乎曹操成败的一项经济政策。但陈寿《三国志》中仅有“是岁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⁹⁾十三字。而裴松之于此处引王沈《魏书》所载二百余字，是目前所有关于曹魏屯田最为直接的一段材料。

《魏书》曰：“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赢。民人相食，州里萧条。公曰：‘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史岁乃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并兼灭群贼，克平天下。”

另曹操发过三次求贤令，陈寿《三国志》中只载其二。关于曹操最后一次求贤令则没有记载。

《魏书》曰：“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汙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汙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¹⁰⁾

前面两次求贤令分别为建安十五年、建安十九年颁发。后一次求贤令则发布于建安二十二年。这一求贤令中的言词较之前面两令又更加激烈，集中反映了曹操政治意图，其史料价值弥足珍贵，幸赖王沈《魏书》得以保存。

第三，对鲜卑乌桓的历史作了较为详实的记载。关于鲜卑、乌桓的历史，陈寿《三国志·魏志》、《晋书·载记》都有不同程度的描述，但



这些描述重在战争和政治,而王沈《魏书》对于鲜卑、乌桓的婚俗、葬俗、生活习惯、活动区域等作了扼要而精当的叙述,裴松之注引一千五百字,均属研究鲜卑、乌桓社会生活、习俗的珍贵材料。⁽¹¹⁾

孙盛,出身于太原另一大族——孙氏家族。孙盛著述颇丰,据《隋书·经籍志》载,有《孙盛集》五卷,《魏氏春秋》二十卷,《晋阳秋》三十二卷。⁽¹²⁾

据统计,《三国志》裴松之注中注录孙盛的著述共有89处。其中收录《杂记》2处,《魏氏春秋》21处,《晋阳秋》14处,《蜀世谱》4处,《异同记》2处,《异同评》1处,其余为“孙盛曰”者45处。这89处在《魏志》中注录60处,《蜀志》中注录21处,《吴志》中注录8处。引文最长者达2750余字。由此可见,孙盛对魏、蜀、吴三国史有精深的了解。

《晋书》本传载孙盛著《晋阳秋》,“词直而理正,咸称良史焉”。《晋书》特举《晋阳秋》对桓温北伐枋头失利时颇有微词。桓温看后大为不满,对孙盛的儿子说,如果照此记载,你的家庭将有灭门之灾。孙盛之子哭着请孙盛删改。孙盛听了大怒,坚决不答应。说明他修史坚持直笔的坚定立场,确实难能可贵。

又如孙盛写曹操事褒贬得宜,写曹操起用张辽时论曰:“是以魏武推选方员,参以同异,为之密教,节宣其用,事至而应,若合符契,妙矣夫”⁽¹³⁾。确是精到的史识。但同时,对曹操的权变奸诈也给予毫不留情的揭露。如其《杂记》记载曹操:杀其朋友吕伯奢家人事,“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¹⁴⁾。又如裴注在《三国志》载曹植之死,“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无欢,遂发疾薨,时年四十一”⁽¹⁵⁾。孙盛评论曰:“异哉,魏氏之封建也!不度先王之典,不思藩屏之术,违敦睦之风,背维城之义”,颇具卓识。又如《魏志·武文世王公传》注引《魏氏春秋》载曹冏上书纵论封建言论,共2750字。对于研究魏晋禅代原因、古代家族政治以及王朝体制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孙盛对刘备托孤之事也有独到见解。史载:“刘备谓亮曰:‘若嗣